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青年就业之探

一

北大承泽

参考

002期

2023年7月

主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办：北大国发院智库，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目录

青年就业之探

热点分析

02

张丹丹：青年失业——问题与原因.....02

李力行：零工经济——机遇与挑战..... 06

产业观察

08

王景颇：解码追赶升级——中国芯片产业之洞察..... 08

米磊、卢小保：中国芯片产业追赶升级：掣肘、举措与展望..... 11

管理课堂

15

杨壮：VUCA 时代需要有愿景、有能力、有品格的领导者..... 15

王进杰：技术变革推动领导者进入终身学习时代..... 18

承泽精选

21

黄益平：走向新的经济模式.....21

卢锋：青年就业处在最困难时期 但凡能帮助年轻人就业的举措都是有益的.....27

热点分析

编者按：近年来，城镇青年失业率不断攀高，引起了社会和决策层的关注。分析发现，城镇青年高失业率现象，既是长期需求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导致的，也是短期内高校毕业生供给大幅度上升导致的结果。目前我国青年失业人口在全部失业人口占比为6%，尚未影响到整体劳动力市场就业景气程度。据分析，短期内青年就业不足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高校毕业生表现出偏好“考公”“求稳”等就业倾向。积极合理疏导大学生群体，鼓励灵活就业的新经济形态，同时采取措施加快经济复苏，是解决当下青年人失业的可能出路。

张丹丹¹：青年失业——问题与原因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6月的调查失业率，青年失业率为21.3%，再创新高。这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青年失业率超过20%。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连续突破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何看待青年人的高失业率？

下图描述了自2018年1月至今的月度城镇失业率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城镇青年高失业率常年居高位，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10%以上。即使在2018年初，青年失业率的最低点亦是整体城镇失业率的2倍。

此后，青年失业率持续波动上升，城镇失业率则一直保持在5%左右（只在2022年2月和2022年4月超过6%），到2023年初青年失业率超过20%，为城镇失业率的4倍。



图1 中国城镇失业率2018.1-2023.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 张丹丹：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北大国发院助理院长、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聘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

在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同时，我国城镇就业状况在过去五年，特别是近半年并未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那么为什么青年群体失业率高企没有传导到整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原因是青年群体失业率虽高，但该群体的体量很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24岁失业青年人口约占16-59岁调查失业人口的6%-7%。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16-24岁人口在16-59岁城镇人口中的占比为18.8%；并且，16-24岁青年群体中有2/3为非劳动力（主要为在校生），不被计算在劳动力当中，这使得劳动力中16-24岁的群体占比更低。相比25-59岁城镇劳动力的主力军，16-24岁青年群体只是就业市场的少数。因此，我国整体就业形势并没有因为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恶化而受到很大影响。

即便如此，青年群体的就业状况和福利水平仍需被关注。一方面，有研究表明，如果青年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就业市场不景气，对其未来的发展和长期福利水平会造成显著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青年是犯罪的主体，其失业问题严重易导致犯罪率上升，从而对社会安定造成不良影响；并且，我国青年失业率已经远高于其他主要国家²，亟需得到社会的足够关注。因此，尽管整体就业市场运行平稳，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现象仍关系到整体社会稳定和青年个体福利，需要深入研究分析其原因并尽快寻求解决路径。

为什么青年群体失业率大幅度增加？

针对我国青年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的原因，需要区分长期和短期，并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下图考虑了季节性波动并比较过去5年的同一月份的青年失业率，自2020年开始青年失业率开始上升，2020年和2021年相对于2018年和2019年失业率上升了2个百

分点，2022年相对于2021年进一步向上平移了2-3个百分点，2023年则比2022年又向上浮了2个百分点。同为5月份，2023年的青年失业率（20.8%）比2018年（9.6%）高出超过10个百分点，为当时的2倍多。可见，当下城镇青年的高失业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受长期因素影响累积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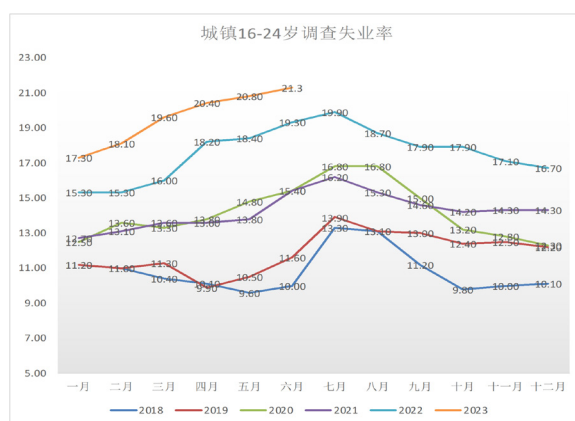


图2 城镇16-24岁调查失业率的跨年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长期看，青年失业率高的问题首先应当归因于2020年以来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消费、企业营商环境乃至经济整体活力具有持续性影响，致使经济增长加速换挡，具体而言GDP同比增速较疫情前下降了2.4个百分点。本人的研究团队近期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中心某用工平台数据的研究发现，2022年底的疫情对苏州、昆山等地的制造业就业带来了严重打击，直至疫情后的2023年3月，其就业只恢复到此轮疫情之前2/3的水平。青年群体是制造业中的就业主体，因而也受到更大的冲击。

其次，2021年以来，关于教培、房地产、互联网平台等特定行业的规制政策密集出台，在

2. 截止2023年4月，欧盟国家青年失业率为14.3%，英国为11.3%，美国和韩国均为6.5%，日本青年失业率在5%左右。疫情后大部分欧美国家的青年失业率不断下降，日韩则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只有中国青年人出现了失业率高企的现象。



规范行业的同时，对就业，特别是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造成冲击。作为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的青年群体自然首当其冲，导致其失业率逐年上升。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AI）的快速发展也可能加剧了青年失业。北大国发院和智联招聘近期联合发布的报告《AI 大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中指出，目前我国已初现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工的趋势，过去五年 AI 的发展和近半年多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的发展导致 AI 技术暴露度高的职业的用人需求出现下降趋势，而 AI 技术暴露度高的职业主要集中在财务、银行、翻译和销售等白领工作，对高学历冲击更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影响因素对高、低技能水平的青年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事实上，按照教育程度或技能水平进行划分，可将青年群体区分为技工和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两个相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技工群体的就业主体在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容纳了一亿体量的产业工人。下图中制造业工价指数反映了制造业用工的供需情况，工价上升说明供不应求，工价下降说明供大于求。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国制造业工价在 2 月份达到近几年的最低点，说明疫情影响下制造业订单大幅度缩减，用工需求持续下降，此后 3-7 月工价缓慢回升，说明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技工劳动力市场也在回暖。



图3 2023年制造业工价指数

数据来源：新市民研究院

既然今年 3 月以来，技工就业市场的景气状况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可以大胆推测 3 月份之后青年群体的失业高企应该主要表现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现实数据证实了我们这一猜想。根据中国就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高校毕业生求职申请人数在近期出现飙升，远快于招聘需求人数的上升，求人倍率（每位求职者对应的岗位数）在大幅度下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状况。

从劳动供给来看（见下图），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相比常年 20-30 万的年均新增毕业生，2022 年相比 2021 则猛增 150 万毕业生，增幅达 16.6%，其中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增加了 17%，研究生毕业生增加了 12%。预计 2023 年高校毕业生总数达 1158 万人，相比 2022 年激增近 105 万人。但据报道，2023 年研究生招生规模预计为 120 万，比 2022 年的 124 万并没有增加，所以，能在国内继续学业的毕业生比例下降。另外，毕业生大幅增加也是 2020 年疫情以来为了规避就业，近两年延迟毕业和继续深造的在校生增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疫情年间的青年就业问题积重难返，累积三年之久在近期爆发。因此，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叠加疫情等因素冲击，导致了近几个月青年失业率的飙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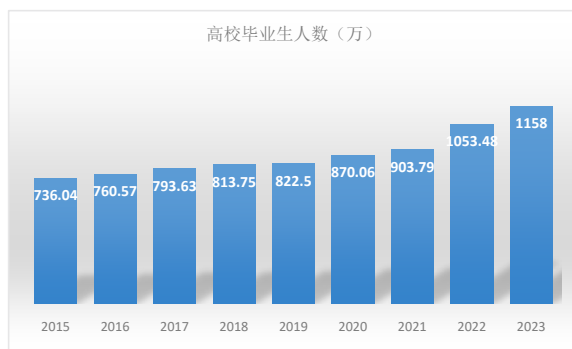


图4 高校毕业生人数（2015-2023）

数据来源：《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

高校毕业生的选择与青年失业率探究

作为高校毕业生的一个主要选择，近几年的高校毕业生考公务员（即“考公”）的人数大幅度上涨。如下图所示，国考的报名人数在2022和2023两年出现了大幅度增长，2019至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稳定在150万人以下，2022年飙升到220万，到2023年进一步增加为250多万，增加了80%。“考公”比例大幅度上升，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偏好。而“考公”招录人数仅为3.7万，招录比仅为70:1，并不能解决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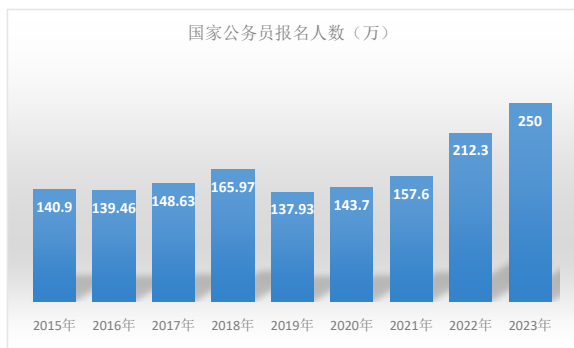


图5 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2015-2023）

数据来源：公务员考试网

除了继续深造和“考公”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劳动力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部分群体也不容忽视。就业市场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大量劳动力会选择观望、等待，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部分人也被称为“受挫的劳动力”或者“隐性失业群体”，他们通常被失业率统计忽略，导致对劳动力整体情况的误判。因此，讨论失业率的变化需分析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并未公开发布青年人劳动参与的统计数据，无法追踪其随时间的变化。根据我们获取的统计局2023年3月城镇16-24岁人口

劳动参与数据，全国城镇16-24岁人口约9600万，其中非劳动力占比2/3，为6400万，劳动力占比1/3，为3200万（包括2570万就业和630万失业人口）。总量为6400万的非劳动力中，在校生共计4800万，剩余1600万人为非在校生。他们大多选择“躺平”，不工作、“啃老”，即所谓的“全职子女”。如果把这1600万非劳动力中的非在校生都考虑为“失业”状态，我们可以计算2023年3月青年失业率的极大值，即 $(1600+630)/(1600+630+2570)=46.5\%$ ，远大于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即 $19.7\% (=630/(630+2570))$ 。

基于西南财经大学的202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计算，在毕业后不工作的17-24岁青年群体中高校毕业生约占到3/4，其中大专、高职占18%，本科及以上学历占56%，且相比2017年和2019年的该调查数据，近年来大学生“躺平”不工作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对于大学生的就业表现，智联招聘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总结：2023届毕业生求稳心态持续上升，选择单位就业的比例上升（达到58%），“慢就业”比例明显上升并占整体的近1/5。

综上所述，在2023年初凸显出来的城镇青年高失业率现象，既是长期需求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导致的，也是短期内高校毕业生供给大幅度上升的结果。目前我国青年失业人口约为600万，只占全部失业人口的6%，并不影响整体劳动力市场就业景气程度。据分析，短期内青年就业不足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且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占据青年无工作群体的大多数。高校毕业生表现出偏好“考公”“求稳”等就业倾向。按季节性波动趋势预测，今年7、8月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当下合理疏导大学生群体，降低就业和薪酬预期，先就业再择业，同时加快经济复苏，是可能解决当下青年人失业的出路。



李力行³：零工经济——机遇与挑战

数字经济下的零工就业

零工指的是在工作内容、时间等维度上体现出零散和短期特征的工作，而零工经济则泛指产生零工就业的经济活动。传统的零工包括家政、工地短工等。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便捷的信息通讯手段促进了劳动供求双方之间的信息搜寻和匹配，使得新兴的、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零工就业大量涌现，零工经济蓬勃发展。

三个方面的转变值得注意。

1. 从固定工作转向灵活择业。基于互联网提供服务的知识密集型零工，如众包翻译、程序员等，可以通过平台接受工作任务，自行选择时间和地点来完成工作。那些提供本地服务的零工，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何时接单、接什么样的订单。工作时间、地点、长度等方面的灵活性，满足了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择业需求。“逃离大厂的年轻人”“日结工”等现象的流行就反映了这一点。“数字游民”指的是那些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工作，从而可以随处居住的劳动者，他们可以选择到房价便宜的鹤岗或者气候安逸的大理生活，这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梦想的工作方式。

2. 从单一职业向多元就业转变。零工从业者

可以自主决定在哪个平台工作，也可以更为具体地决定工作时间在不同平台的分配，这就使得一人从事多种职业成为一种新趋势。近年来流行的“斜杠青年”就反映了多元就业的趋势。

3. 创业内涵的转变。电商平台、众包平台、共享办公、数字金融等平台的崛起，降低了创业的成本，催生了一大批平台依赖型创业者，他们与基于平台从事零工的劳动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据美团的调查，多达四分之一的外卖骑手曾经是创业者，大部分骑手的职业规划是未来创业或做小生意。就业与创业，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创业式就业”的苗头早已出现，如今则更加普遍。

就业转变带来的机遇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全国有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以零工就业为代表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零工经济也催生了许多新职业。例如，电商销售涉及到生产、广告提供、交易、售后服务、配送等一系列过程，仅仅其中

3. 李力行：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杂志执行主编；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曾获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的广告展示环节就产生了主播、主播助理、直播选品师、直播间上链师等新职业，这些工作一般没有固定的“就业单位”，具有灵活、多元等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净增了168个新职业，一共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占职业总数的6%。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在2018年至2022年间，互联网提供的工作机会大幅上升，在疫情之后占比达到了30%以上。其中，零工经济、线上娱乐、线上消费、自由职业和互联网技术是五大数字化和新兴职位，贡献的招聘职位数占所有职位的比重由2018年初的不到10%上升到2022年7月的接近14%。

对劳动者而言，零工就业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就业蓄水池，为脆弱人群提供了大量低成本、便利的就业机会，这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对企业而言，通过数字化改造，许多整份的劳动岗位可以被拆解为一项项的工作任务，由不同劳动者在不同时间、地点来提供。劳务外包、研发外包等更为普遍，固定就业岗位被外包或零工所取代，企业从中节约了大量成本。此外，企业内的沟通协调也会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容易，通过扁平化改造、裁减中层管理人员数量，企业可以节约人力成本。另外，对智联招聘发布的职位和工作任务的分析显示，那些受到人工智能影响更严重的工作岗位，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人工被替代的趋势，这体现了企业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的适应性调整。

客观认识零工经济的挑战

以零工就业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意味着雇佣关系发生了深层次转变，也给劳动者福利、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正规部门、固定就业单位的模式下，双方构成从属性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政府以此为标准来规范劳动力市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劳动保障、社会保险，乃至公共服务体系。例如，政府通过就业单位收取“五险一金”，并提供相应的保险保障；职业培训等其它一些公共服务也通过就业单位间接接触及劳动者。

过去三十年来，几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工商业部门实现就业，并经由就业单位加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从而进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这是我国公共服务体系覆盖面扩容的最主要途径，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经济增长并非线性，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技术进步等各种冲击之下，正规就业岗位的持续增加总有尽头；建立在其上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就将相应遭遇挑战。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就业正规化比例持续保持低位，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升；又如，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欧洲多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移民涌入、年轻人失业率高企、政府财政严重赤字、高标准的社保体系难以为继的困境，而推迟退休年龄、削减福利等改革措施则引发了一轮轮的危机。

对我国而言，在经济增速下降、零工经济蓬勃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正规就业岗位增长乏力。以零工就业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愈发普遍，依赖就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体系并不能覆盖这些新的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群体，劳动争议、工伤保障，乃至养老保险等问题会日益显现。实际上，以骑手为代表的零工遇到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只是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他们在社会保险等更广义的公共服务的公平获取方面也都存在困难，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现有的劳动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如何扩容以覆盖愈发重要的灵活就业群体，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一个主要的挑战。

王景颇⁴：解码追赶升级——中国芯片产业之洞察

题记：随着我国在高技术领域竞争优势快速升级，发达国家加大力度实施对华高技术产业的封锁。以芯片产业为例，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等手段，对我国芯片产业关键技术与供应环节实施封锁，以严格限制我国高制程芯片的研发、技术升级、生产制造等。如何破解我国芯片产业追赶升级的挑战？北大国发院梅亮副研究员深度采访了我国芯片产业从业专家王景颇先生，请其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追赶升级举措做研判。

产业现状：芯片的进口规模与技术差距多大？

市场层面：芯片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品类，且中国芯片产业仍然高度依赖国外进口。以海关总署 2017 年至 2022 年数据显示（如图 1 所示）：中国芯片进口规模持续上升，2022 年规模总体达到 4156 亿美金，约为进口规模排序第二的原油和排序第三的铁矿石之和⁵。同时，所有进口芯片中，计算芯片、存储芯片、模拟与通讯芯片等，各自占比约 1/3。



图1 中国芯片进口规模趋势(2017-2022年)

技术层面：芯片制造的全流程总体包含：IC 设计，芯片制造，芯片封装与测试。目前，中国在芯片封装与测试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仅在 3D/2.5D 封装还存在一定差距；芯片设计领域 28nm（nanometer, 纳米）及以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实现全自主化设计。28nm 以下高端制程芯片（包括：CPU、GPU、FPGA、DSP）尚存在卡脖子技术限制，如芯片设计所需的 EDA 工具、IP、CPU 架构等主导设计目前均被国外厂商垄断；芯片制造环节是目前中国芯片产业突破技术限制与实现产业升级的核心瓶颈，

4. 王景颇：苏州异格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新华三集团原联席总裁、北大国发院 EMBA2008 级校友。

5. 注：2022 年进口原油 + 铁矿石为 4935 亿美元。

高端制程芯片的晶圆厂技术能力与台积电等领先企业存在 2-3 代能力代际，芯片制造设备（如光刻机）及高端原材料基本依赖进口。目前，我国芯片制造在 14nm 制程主要聚焦良率和性能提升，7nm 及以下则严重受到光刻机设备卡脖子掣肘。

技术要点：芯片制造为什么难？

芯片产业是目前人类最复杂的产业之一。在 IC 设计、制造、封装与测试的整体产业环节背后，芯片制造之难主要表现在：

1. 芯片制造需要涉及 50 多个基础学科，包括物理、化学、材料、电子、光学、机械、自动化、计算机等等，这些学科相互联系，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和突破以支撑芯片制造基础科研能力；

2. 芯片制造需要经历数千道工序，包括硅晶圆制造、薄膜沉积、光刻、刻蚀、离子注入、互连等等，这些工序之间需要严格地控制参数和条件，以保证芯片的质量和良率，因此，芯片制造需要高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以及大量的检测和反馈；

3. 为了实现更小的晶体管尺寸，就需要开发更高能量的光源和更精密的光刻机；

4. 为了提高芯片性能和可靠性，就需要研究更优质的材料和更精确的掺杂技术。

产业追赶：中国发展芯片产业有何优势？

为什么中国芯片产业存在追赶优势条件？

1. 传统电子芯片领域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已经失效，高端制程芯片制造的技术升级空间已经饱和，为中国芯片产业的追赶提供了条件；

2. 我国拥有芯片产业的大市场优势。如果没有这个市场，芯片根本发展不起来，正因为市场

很大，国家可以做一些针对性工作，通过市场扶持以自主发展芯片产业；

3. 华人行业专家的情怀。芯片产业的华人专家有很多是有情怀的，他们在国外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许多到了退休年龄，但是仍保有投身我国芯片产业发展的激情；

4. 创新体系的优势。未来 10-15 年是国内芯片产业的黄金期，包括中国芯片产业的产业政策、市场、技术人员的增加等等，最终是创新体系综合的力量引导发展。

当然，我国芯片产业前期的基础比较薄弱，尤其是底层技术的积累非常薄弱，需要给本土产业更长的积累时间。当前进步与追赶的速度已经很快。

痛点聚焦：如何理解并做到自主可控？

目前我国芯片产业追赶的痛点核心还是在于美国的技术管理与封锁。比如 2022 年 10 月 7 日美国发布的针对芯片与先进计算的出口管制“新规”，先进计算背后考验的是芯片的算力和性能，“新规”关于技术物项的出口管制以及新增加的对于美籍人员的限制，对我们产业的追赶升级影响很大。

管制与封锁的背景下，从产业链来看，封装与测试环节中国已经实现自主可控；设计环节则需要突破 EDA 工具的限制，目前国内企业在大力投入，假以时日 EDA 的自主可控就可以解决，因为 EDA 工具用得越多、持续迭代升级，性能就越好。所以，封测和设计可以解决自主可控。目前需要面对国际供应链封锁的主要是制造环节，包括晶圆厂、晶圆制造等，核心在于高制程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存在“卡脖子”。

目前国产 28nm 芯片已经完成自主可控，可以称之为“全 C 产业链”，即不需要美国的技术物项；14nm 芯片制造未来 2-3 年可能可以追赶



上来，核心在于光刻机的“卡脖子”；其他设备如刻蚀机虽已突破，但是光刻机的限制直接影响到高制程芯片的良率与性能，比如 7nm 必须使用 EUV 光刻机外，14nm 可以不用 EUV 而通过二次曝光进行制造，但是良率很低，目前尚未解决。光刻机是整个芯片制造这个超复杂系统中最难的部分。

芯片产业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分工合作的产业，它一定是基于开放的全球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的产业体系，这是根本前提。即便 ASML 的光刻机也不是靠自己独立完成的，其包含几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如果不寻求全球合作，纯粹自己独立做芯片是没有产业追赶与自主可控机会的。

考虑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即便美国任何技术都不支持，甚至与芯片相关的敏感学科都不允许中国人求学，中国芯片产业的开放合作仍应该大力推进，中国也还是有机会实现芯片产业的追赶与升级。比如，可以寻求与日本和欧洲的合作。

机制解析：如何实现中国芯片产业追赶升级？

1. 回归市场机制本质，政府政策支持配合。

需要发挥市场机制中最核心的企业家精神。而市场机制的背后也需要政策支持，发挥政府对市场的牵引，比如产业“母基金”的模式，政府把钱给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最终通过用户与企业家精神实现产业突破。由此，需要将市场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进行有效配合。但政府支持的核心在于扶持与赋能芯片产业中的优质企业，而非扶持落后低效的企业以寻求资源分配的平衡；实现效率与创新能力优先，而非所有制优先；同时需要推进开放式发展，在开放与公平的前提下激活市场潜力与企业家精神。

2. 产业体系的整体升级与支撑。芯片产业的追赶与升级根本上依赖中国工业化基础改善与制造业整体升级，这给芯片产业提供了一个“创新环境”，也提供了芯片产业的工业化配套与产业基础体系，典型如三一重工全球最长的机械臂用于日本核泄漏的安全辅助、全球最大盾构机生产对于工程作业效率的改善等，均深度依赖中国产业体系整体“创新环境”的优化。

3. 政府科学有为：可以进一步比较美国政府与英特尔、韩国政府与三星等例子，来看芯片产业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效果。

4. 政策环境：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长周期过程中，需要深度依赖稳定的政策环境。

米磊、卢小保⁶：中国芯片产业追赶升级：掣肘、举措与展望

题记：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芯片产业遭遇美国前所未有的限制与封锁，近几年始终处于一边被打压一边自力更生的过程，包括芯片制造、设计、研发、设备等领域，均处于努力追赶的过程。追赶过程中，我国芯片产业升级的掣肘在哪里？美国技术管制的影响如何？如何实现我国芯片产业的追赶与升级？为此，北大国发院梅亮副研究员与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采访了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博士与中科创星董事总经理卢小保博士，请其从行业专家的视角做解读。

产业追赶升级掣肘：非“技不如人”，实“器不如人”

半导体产业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工业链条，是全球市场 + 全球竞争 + 全球合作的典范。该产业的最终出口就是芯片产品，其下游就是各式各样的电子信息产业终端产品。但芯片产业主要包含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环节，同时有两个底层的支撑行业——半导体装备材料和EDA工具：前者是芯片制造的支撑，后者是芯片设计的支撑，

只有二者整合，才能把芯片设计并生产出来。

目前从国内芯片产业整体来看，单论芯片设计环节，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世界一流，仅落后于美国；芯片制造环节，我们能力尚可，但是先进工艺难以突破；相比之下，在支撑环节，EDA工具，尤其是装备材料的支撑能力，还处于明显落后的追赶阶段。

支撑环节为什么落后？

首先，EDA全世界只有美国领先，芯片设计的EDA工具（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包括设计工具、仿真工具、各种检验工具等，包含上百个具体的软件点工具）全部掌控在美国人手中。美国将中低端芯片设计、部分制造能力，包括一部分设备和半导体材料产业等，转移到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但始终牢牢掌握最尖端的EDA工具，以及关键的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产业，同时掌握尖端的芯片设计能力（比如英特尔、英伟达、博通、高通、ADI、TI、镁光等）。

其次，芯片设计需要半导体制造能力支持，主要涉及先进工艺。先进工艺领域中国也有不错

6. 米磊：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研究员、陕西光电子先导院执行院长。
卢小保：中科创星董事总经理。



的积累,在全球也仅仅落后于中国台湾、韩国三星,以及美国,而且我们一度也快速进到 10nm 甚至 7nm 的工艺节点,单纯集成电路生产工艺能力上我们也不算太落后。不是“技不如人”而是“器不如人”,也即芯片生产工艺被卡脖子,更多源于买不到用于芯片制造的设备 and 材料,比如买不到光刻机、高能离子注入设备等,没有这些支撑,我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欣慰的是,中国作为大国,所有的工业门类都非常齐全,事实上在芯片产业的所有环节,包括制造、EDA 工具,半导体设备、材料等,几乎都有本土公司在跟进,国家都有提前布局。只是越往底层,技术能力的进步速度就越慢、迭代周期就越长、直接的经济价值越低,相应的市场体量就相对更小、人才密度也更低。

所以 EDA、芯片制造设备及材料等底层能力,追赶的差距就比较大,追赶进步速度也会比较慢。

产业追赶升级掣肘：全球化与美国对华打击

芯片产业本质上是一个全球合作、全球竞争、全球市场为特征的产业,ASML 不仅是荷兰的 ASML,更是全世界的 ASML,是全世界所有最优秀的人一起努力把它打造成一个高水平的芯片光刻机生产商。不可能有任何一家公司、甚至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做出来顶尖光刻机这样复杂的系统产品。

国家已经提出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掣肘、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与双循环体系。就芯片产业来看,要达到中低水平的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本土产业链是可以做出来的,但要达到高水平甚至全球顶尖的自主可控,不推进全球开放合作则做不到。

产业链的角度,美国处于芯片行业的霸主地位,表现在:

1. 美国有一个长臂管辖法案,对芯片产业链上用了美国技术(包括直接技术和间接技术)的实体进行出口管制;

2. 芯片产业核心最底层的专利、最底层的设备材料甚至关键零部件等技术物项全部掌握在美国手里;

3. 日本人、韩国人,以及中国台湾人等芯片行业的人才,其实都是在美国学习出来的,他们学习的相应技术或者底层知识架构,都来源于美国的底层创新技术,以及美国名校创新项目的支持,这种情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持续。

美国目前对中国芯片产业主要使用的实体清单出口管制工具,总体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1. 实体清单底层逻辑在于,芯片相关的技术尤其是美国的技术卖给其他国家实体的时候,有可能应用到特定领域(如军工),进而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这个底层逻辑不仅仅针对中国,针对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机制;

2. 对于中国尖端科技发展的限制,即只要你的技术足够尖端,已经威胁到或者未来可能威胁到美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美国就要想办法打击与制裁,以确保自己的技术领先优势。典型的例子是新兴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美国打击制裁了中国该领域的所有顶尖企业,意图阻碍至少延缓我们的进步速度。这样的政策长期来看对于我国面向未来的、尖端技术产品相关的产业可能产生比较重要的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大量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力等,算力最终来源于先进的 AI 芯片、CPU 和 GPU 芯片,以往 AI、GPU 这些的持续迭代,中美在芯片底层技术领域的代际差可能 7-8 个月;现在技术管制与封锁下,我们的差距可能就要拉大到 3-5 年。

产业追赶升级举措：芯片传统赛道之升级策略

我国芯片产业追赶与升级的第一个解决方案是用次先进工艺，比如用 10nm 的工艺去拼 5nm，也许功耗更大、芯片面积更大、成本更高，但是勉强可以实现 5nm 或者 7nm 的性能。这需要付出两到三倍的成本去达成原目标成本下 80% 的性能，但这样做有机会解决从 0 到 1 的问题（有和无的问题）。这是目前国内芯片产业努力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解决方案是加大国际合作，与日本、韩国、欧洲等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服务于三星、台积电芯片制造的供应链伙伴等。这些国家或巨头企业对于芯片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具备资源和能力，尽管美国政府对于它们也施加出口管制压力，但是它们也需要考虑中国芯片市场的价值。尤其在芯片行业目前下行趋势下，如何利用好日韩台欧的部分产业链资源，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选项。

第三个解决方案是我们正在努力布局的一些新领域，可以弯道超车的领域，比如光子芯片、量子计算、存内计算等。比如光子计算从本身特性上来讲，传输速率比电子传输速率高 2-3 个数量级，理论上光传输的功耗是电子的千分之一。人工智能芯片讲究的就是算力功耗，如果速度更快、功耗更低，那么算力功耗比就会更高。光子 AI 芯片，包括其矩阵计算架构，从工程角度已经进入初步的商业落地阶段，性能功耗比可以媲美英伟达最先进的 GPU 芯片。而且目前在这一新兴领域全球都处于探索阶段，技术路线并没有完全确立，领先国家也没有实现技术垄断，产品的主导设计并没有形成。未来这一领域的创新有可能颠覆目前以 GPU 为架构的产业基础。

光本身的物理特性，因为折射衍射，本身就可以直接去做矩阵运算，这是天然的优势，所以如果把 AI 芯片中运算的部分加上矩阵运算，效率

就可以极大提升。此外，光子芯片不依赖于先进工艺制造，不依赖于先进半导体设备，用 90nm 的工艺就可以实现，可以突破传统先进电子芯片制造设备的卡脖子困境。

产业追赶升级举措：新型举国体制之力

对于发展芯片产业，中国在体制上是有优势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些新兴的方向，如果技术大方向在逻辑上可行的话，其实发展的关键在于：大家要一起努力去推动，要形成一个共识，包括链条上所有芯片设计公司、做算法的公司，下游的应用资源等等，围绕特定方向的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各个利益攸关方一起努力推动，实现上下游的协同。

商业公司总体还是讲投入产出比的，但是政府指挥棒很大程度上可以投入到卡脖子问题的解决。这需要整个产业生态伙伴的支持，因为持续支持迭代才可能实现芯片产业的进步。政府政策需要帮助协同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协同，努力打造一个协同共赢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政府如何有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执行：

1. 国家应该扶持的是芯片产业追赶与升级中的基础性、宏观性环节，进行长期持续稳定的投入，而不是轻易去扶持某一个企业。需要注重培养产业链上的人才。在最高效资源配置是市场的前提下，政府需要对产业重点短板、市场不愿意投入的投入产出比低的关键环节、基础性周期性的行业共性环节进行投入。而芯片产业里的具体产品、商业活动等，还是应该交由市场主体的企业去做；

2. 如果国家必须要扶持特定的企业，那么应该重点扶持龙头企业，真正做到“扶强退弱”。现在国家推进“揭榜挂帅”制度，这个模式很好，尤其对于重点卡脖子领域。



未来展望：两手抓

在传统电子芯片产业领域，先进工艺等方面中国要做到不要掉队太多，尽可能实现跟跑，因为这占据了芯片产业 90% 的市场份额，且 20 年左右的时间窗口期还很难看到颠覆性的主导设计能够实现替代。这个领域我们的定位应该是努力

跟随，并尽力在特定的产业链环节实现超越追赶。

在产业新兴技术领域（比如光子芯片、量子芯片等），需要重点支持差异化、非对称发展，在重点新兴技术赛道加大支持做长板。

这两个部分都需要努力。

杨壮⁷：VUCA 时代需要有愿景、有能力、有品格的领导者

VUCA 情境给世界带来的挑战：

“VUCA”即 Volatile（易变）、Uncertain（不确定）、Complex（复杂）、Ambiguous（模糊）四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代表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UCA 今天影响到了经济、政治、技术、外交不同领域：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给人类身心带来了巨大伤害，中小微企业发展生存受到重创；疫苗和药物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乌俄战争给世界和平带来重大威胁；美俄关系、欧俄关系、日俄关系动荡紧张，剑拔弩张，让核战争爆发变成一种可能；中美关系从 20 年前的战略合作伙伴变成了今天最大竞争对手，严重影响两个世界大国正常商业往来，双边关系变得极为脆弱和不确定，世界秩序也因此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后，新的 AI 技术雨后春笋般（如 ChatGPT）诞生，传统知识更新迭代速度加快，提升了组织效率、人民生活便利性，同时导致企业战略决策过程变得越发复杂和混沌，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规模致胜，赢者通吃；AI 技术给社会进步带来无限想象空间。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机器无法改变国家特质、民族属性、人性本质，如果人类丧失信仰和价值观，根本无法引领驾驭 AI 技术和机器人的发展和走向，全球政治势必更为动荡，国际经济不可持续，世界和平无法保障。

面对 VUCA 情境下全球遭遇的严峻政治、经济、文化挑战，有效应对方式只有全面提升政府和企业领导力水准。VUCA 世界需要领导者的视野、使命、品格去激励员工，鼓舞士气，引领变革，战胜困难。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领导力的本质，明晰领导者的价值观，提升领导者的综合素质。

卓越领导力的核心理念和思想精髓

1. 领导力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行为。美国教授库泽斯和波士纳定义领导力是“动员其他人为共同的愿望而奋斗的一项艺术”。两位教

7. 杨壮：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原联席院长、美国纽约福坦莫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



授认为领导者通过五种行为去引领激励下属，这就是：身体力行、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但是这五种行为必须通过领导者自身培育的优秀品质才能得以实现。通过近半个世纪的调研（每十年一次），他们发现卓越领导者身上有四种突出特质，按顺序排列：正直诚实（honesty）、远见卓识（visionary）、称职胜任（competence）、激励人心（inspiring）。

2. 领导力不是头衔、权位，领导力就是影响力。领导力专家马克斯维尔认为领导力有五个层级。第一层级是位置领导力。大家追随你仅仅因为你的位置、头衔、权力，不是你的为人和能力。第二层级是关系领导力。领导者必须尊重下属，建立关系，吸引下属，赢得下属发自内心的追随。第三层级领导力是业绩领导力。马克斯维尔认为领导者一定要有能力和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力获取业绩。第四级领导力是育人领导力。领导力不仅要建立关系，注重业绩，更要重视人才，培养人才，逗留人才。第五层级就是巅峰领导力。达到这个境界的领导者能够洞察人心、尊重人性，同时具备超越常人的愿景，为改变世界奉献一生。

3. 领导力不是荣耀，不是权力，而是价值、责任、成就。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而社会生态学属于道德范畴，不能“价值中立”。德鲁克在其著作中，认为管理者和领导者应该强调“责任”，不是“权力”；强调“顾客”，不是利润；强调“绩效”，不是平庸；强调“实践”，不是知识。德鲁克同时指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因此德鲁克一直强调领导者不仅要正确做事，而且要做正确的事。

4. 卓越领导者不仅需要突出领导技能，还要具备“谦逊”“坚毅”品质。美国斯坦福大学柯

林斯教授把卓越领导者分为五个级别：第一级领导者：突出个人能力；第二级领导者：善于团队协作；第三级领导者：出色的管理者；第四级领导者“鼓舞下属，激励人心；第五级领导者身上具备一种看似矛盾的混合领导力特质：个人的谦逊（personal humility）（不吹、不装、不浮夸、不骄傲），顽强的意志（professional will）（不放弃、不躺平、勇敢、担当、重视业绩）。

5. 领导力的核心问题是“做人何为正确”？西方领导力专家强调做正确的事，日本管理大师稻盛和夫更加强调做正确的人。稻盛和夫提出人生成功方程式，成功 = 思维模式 * 努力 * 能力。思维模式涉及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生活态度。思维模式在成功方程式中最为关键，从 --100 分到 +100 分；热情为第二位，1-100 分；能力第三位，1-100 分。稻盛和夫认为，思维模式具体讲就是“总是积极向上；有建设性；有感恩心；有协调性、善于与人共事；性格开朗、对事物持肯定态度；充满善意、有同情心；关爱心；勤奋；知足；不自私、不贪欲”⁸。

VUCA 环境下做一个三元领导者：

总结、思考、归纳卓越领导力精髓，我发现全球领导力核心思想和行为聚焦在三个领域：第一，领导者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第二领导者的决策、人才、产品、变革能力；第三领导者的人格、情商、品格气质。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三元领导力”模型，涵盖思想领导力（power of ideas）、专业领导力（power of competence）、品格领导力（power of character）。面对 VUCA 极不确定的国内国际经营环境，三元领导力是应对环境、市场、组织挑战的最佳领导力范式。

8. 参见稻盛和夫所著的《活法》第十四页。

思想领导力涵盖领导者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思维模式。面对 VUCA 挑战，领导者的信仰、梦想、哲学是引领企业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指南针、方向盘。企业家乔布斯、马斯克、任正非、雷军、俞敏洪的理想和价值观改变了或者正在改变世界。中国前总理邓小平、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印度圣雄甘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都有自己的愿景和使命，为国家振兴、民族复兴做出历史奉献。

如果说思想领导者充满梦想，仰望星空，专业领导者就要聚焦专注，脚踏实地。专业领导者必须要做正确明智的决策、吸纳优质的人才、提供一流的产品、及时做出创新和变革。专业领导者善于逻辑判断、慧眼识才、重视品牌、勇于创新。他们善于沟通，心胸宽广，鼓舞团队，激励人心，把愿景变为现实，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神探李昌钰博士，专业主义典范，按中国人方式做人，按西方人方式做事，在管理上，为人谦逊、做人低调、勤奋努力；在职业上，崇尚科学，逻辑判断，

细腻观察，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刑侦破案领域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

品格领导力强调诚信真挚，负责可靠，合作共赢，勇于担当。品格领导者的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在 VUCA 时代对领导和下属之间凝聚性起了重要作用，在他们之间建立一座“信任”的桥梁。京瓷前总裁稻盛和夫经营半个世纪，自始至终主张企业经营者要学习哲学，“做人何为正确”，修炼正确的思维模式，敬天爱人，利他经营，影响了日本和中国成千上万的企业家走正道，做好事，致良知。

管理大师德鲁克用三句话总结概括了卓越领导力真谛，同时也是对三元领导力范式做了精辟的解读。他说领导力本质上就是“提升一个人的视野，使之高瞻远瞩；提升一个人的绩效，使之出类拔萃；提升一个人的品性，使之超凡脱俗”。

参考文献（按顺序排列）：

1. 库泽斯&波斯纳：《领导力》，电子工业出版社
2. John Maxwell. 《领导力的5个层级》《The Five levels of Leadership》译者：杨壮、王进杰。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3
3. 德鲁克：《管理实践》1954；《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管理未来》，1992；《德鲁克精华》，2001
4. 柯林斯：《基业长青》1994、《从优秀到卓越》2009
5. 稻盛和夫：《活法》、《干法》、《京瓷哲学》，机械工业出版社
6. 杨壮：三元领导力-VUCA环境下的领导力模式，《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22年10月
7. 杨壮：《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8. 杨壮、王进杰编：《跨文化领导力》，2022，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王进杰⁹：技术变革推动领导者进入终身学习时代

终身学习的理念自古已有，然而，在当代社会中，为什么它变得更加必要和紧迫呢？随着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的演变，加上人工智能、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持续迭代更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正在经历显著的转变。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知识传播和更新速度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之快，超乎我们的想象。工作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替代，知识可能被更新，人们关注的焦点也转向如何不被时代发展的浪潮所抛弃。

中国社会对知识型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剧增，传统的学习、工作和退休三阶段模式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终身学习和成长。这些时代巨变也使得领导力不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在不断变化的职业环境中，领导者需要适应新技术和创新趋势，通过终身学习发展能力、知识、技能和价值观，以应对日益变化的社会和工作环境。

终身学习理念已经成为培养领导者的重要框架。

“终身学习”为何是必然趋势？

著名的教育学家约翰·杜威于20世纪初对“终

身学习”的概念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学习应该贯穿整个生命，不断增强个人的社会参与和发展”（Dewey, 1986年）。他的“教育生长论”为终身学习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哲学范式。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提出的“干中学”是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从经验中获取生产技能与知识，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累加知识总量。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基于阿罗的“干中学”，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而技术和创新往往伴随着终身学习的需求。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知识的不断更新，传统的一次性教育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在新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终身学习成为无法回避的大趋势。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更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通过迎接挑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领导者的认知、能力和技能得到提升，形成了一个“学习、反思、生产”的良性循环。这为从问题到技术再到商业模式创新的链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在约翰·麦克斯韦尔的《领导力的5个层级》一书中，他也强调了领导者需要持续积累技能和知识，才能灵活应对各种情况，有效地从职位领导力跃迁至认可领导力和育人领导力，从而实现业绩领导力，乃至达成具有跨行业影响力的巅峰领导力（杨

9. 王进杰：北大国发院、北大南南学院助理研究员，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成人/终身教育和国际比较教育双博士学位。

壮、王进杰，2023）。

终身学习不仅对领导者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是社会发展和商业文明的基石。传统教育往往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导致一些人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机会。而终身学习强调学习机会和公平，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在提升整个社会创新能力方面，终身学习使得社会能够汇聚更多创新人才，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个体持续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时，他们能够更好地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推动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此外，通过终身学习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和良性发展，商业文明的进步对于构建向善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有助于缩小社会差距。

技术变革如何推进领导者终身学习？

技术变革为领导者进入终身学习时代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当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已广泛渗透各个领域，它们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重塑了工作环境和职业需求。数字技术与终身学习密不可分。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学习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如今，人们可以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和课程共享网站等渠道随时获取知识和技能，学习时间和地点也更加灵活。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模式不再受传统学校物理空间的限制，为终身学习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此外，技术变革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新旧技术的迭代速度迅猛，引发了新领域和行业的兴起。这促使领导者必须持续学习和获取新技能，以保持竞争优势。

终身学习理论从多个维度为领导者持续学习提供了指导方向。

- “自我导向学习理论”（Self-Directed Learning）强调学习者通过自我评估、目标设定、资源获

取和学习反思，自主地规划和实施学习计划。

- “反思性实践理论”（Reflective Practice）重视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通过反思分析和评估，提取经验教训并应用于实践中，以不断提高自身。
- “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建议学习者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的行为，进行社会互动和合作来获取知识和技能。
- “构建主义学习理论”（Constructivist Learning）强调学习者的主动参与和知识的主动构建，通过与现实环境互动、探索和解决问题，来建立自己的理解和知识结构。
- “社区实践理论”（Community of Practice）关注同行业人员聚集在一起，在特定领域或兴趣领域中分享知识、经验和专业知识，通过群体内部的社会互动实现学习和知识创造。
- “习得理论”（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认为学习是通过经验和实践来获得的，强调学习者通过观察和体验现实世界，反思和提炼经验，并建立新的概念和技能。

这些理论为领导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方法和策略，帮助他们在终身学习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和成长。

无论领导者选择何种学习理论和方法，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并将硬知识和软知识的学习相结合。硬知识指的是具体而易于量化的数据、事实和规则等技术性知识，而软知识则与组织和人的互动密切相关，难以量化（Hilpic, Pouloudi, & Rzevski, 2002）。软知识包括与领导力相关的人际交往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着技术升级、创新压力、组织变革和人才缺口等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的影响也带来了新的变革。因此，企业家和领导者需要采用软硬知识结合的学习模式，以持续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并实现持续发展和创新。



如何落地终身学习？

对企业家和管理者而言，时间管理是平衡学习和工作的主要能力，也是企业发展的保障基础（Perks, 2005）。研究表明，将学习视为个人提升和业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纳入日程安排中，可以提高学习的优先级和可持续性。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性来安排时间，确保学习任务得到充分的时间和专注度，可以提高学习效果 and 成果。学会利用碎片时间也是一种高效的时间管理技巧，充分利用等待时间、交通时间、午餐时间等零散时间段进行学习。值得强调的是，现代社会变幻莫测，互相关联的事物数不胜数，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以“问题为导向”而非“知识为导向”的学习方法变得格外重要，实践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辅以人工智能技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政府而言，鼓励企业发展可以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王中，2019）。学习型社会是基于知识和学习的社会模式，注重个体和组织的不断学习和创新能力。制定相关法规、规范市场环境及提供税收、资金、土地等优惠政策，可以有针对性地帮助那些重视终身学习和创新的企业。同时，政府可加强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提供优惠的培训资助，并将培训项目紧密结合企业的业务需求，从而帮助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通过积极的政策支持、优质的教育培训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可为企业提供学习和创新的动力和条件，并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发展。政府在此过程中担任引导者和推动者，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能力注入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1. Dewey, J. (1986, September).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forum* (Vol. 50, No. 3, pp. 241-252). Taylor & Francis Group.
2. Hlupic, V., Pouloudi, A., & Rzevski, G. (2002). 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knowledge management: 'hard', 'soft' and 'abstract' issues. *Knowledg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9(2), 90-102.
3. Perks, S., & Struwig, M. (2005). Skills necessary to grow micro entrepreneurs into small business entrepreneur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8(2), 171-186.
4. 王中. (2019). 基于治理体系创新的学习型社会建设路径研究. *成人教育*, 39(6), 13-17.
5. John Maxwell. 《领导力的5个层级The Five levels of Leadership》译者杨壮、王进杰。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3。

黄益平¹⁰：走向新的经济模式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的作用显著，但消费相对疲软；二是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扩张，生产成本较低、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然而，我们曾经非常擅长的发展模式将来不得不发生改变。怎么改变？变成什么样？我从两方面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一是短期宏观经济走向；二是未来经济增长模式变化。

短期宏观经济走向

从2008年全球危机以后，我们就一直在努力尝试转变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要转变？有两个原因：一是作为大国经济，出口很难再长期支持经济增长；二是受疫情冲击，国外经济增长也不是特别理想。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一直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希望让消费在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2000年，我国社会总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为62%左右，但到了2010年下降至47%，

十年减少15个百分点，这是消费疲软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客观而言，我国消费在2009年之后有所改善，经过十多年的变化，现在大概维持在55%左右，说明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在回升。但疫情之后，尤其是最近在经济复苏中，消费再次遇阻。

我国过去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如果经济遇到困难，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就靠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稳经济。这在过去习以为常。本轮疫情后，中国又回到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来稳经济的局面，所以会让人有“昨日重现”的感觉。事实上，如今之情况尚不及过去，因为过去还有持续增长的出口的支持，如今出口也日渐艰难。

2023年的经济走势如何？挑战又有哪些？我认为，2023年的经济情况会有好转。新一届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导致经济疲软的几方面因素着手，对宏观政策做了微调或转向：

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商品房政策，此后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左

10. 黄益平：北大国发院金光金融学讲席教授、副院长和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金融科技发展与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主编和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2015-2018）、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事务外部顾问小组成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右。但从2021年7月恒大债务违约开始，房地产行业就出现了融资危机。面对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房地产行业的总体政策略有转向，要求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融资支持，助力行业继续健康运行。会前已经出台一些政策调整，比如“保交房”政策。因此，政策调整在短期内对房地产行业是利好消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应该也会减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平台经济发展做了正面表述。过去一、两年，平台经济受到的压力非常大，影响到行业发展与增长态势。现在针对平台经济的专项整治已经结束，将来会走向常态化监管，以使其更好地发展。高层强调平台经济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最终目的是让其做大、做强、做好。这些政策表述并不意味着对平台经济的支持政策会回到原来的高度，但起码今后的政策会比前两年积极很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23年，财政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相对有限。原来是中央和地方一起发力，但现在地方可以动用的增长资源减少。过去几年，地方财政改革采用所谓“关后门，开前门”，通过融资平台举债来支持增长已经困难，此外，由于房地产市场不好，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也明显减少。总之，2023年的财政政策在支持增长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但空间有限。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的空间可能更大一些。最近几年我国一直实施稳健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利率调整幅度比较小。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美联储连续加息。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空间产生了挤压。虽然我们追求“独立的货币政策”，但如果国际市场的利率远远超过国内，就不可避免地会加大资本外流压力。但现在看美国通胀率已经见顶且下行，美联储加息也接近尾声，这就为我国央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稳增长提供了更多空间。

短期内，我对消费并不乐观。我国消费增长

的速度低于经济增速，尚且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我国消费为何一直不振？

第一，居民户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高，甚至有所下降。老百姓收入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增长，消费增速肯定比GDP增速低，毕竟消费和收入分配有关。

第二，居民户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到社会总需求。经济学里的“消费倾向”，指的是当你有100元收入，你会花掉多少元。穷人的消费倾向较高，其月收入可能只有1000元，开销可能达到1100元，即有可能借钱消费。富人的消费倾向较低，可能每月有10万元收入，最多只消费5万元。由于穷人和富人的消费倾向不同，富人难以提高消费量，穷人无钱消费，所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美国现在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2021年5月，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表示，美国通胀压力的首要原因是疫情期间老百姓多出2万亿美元的储蓄，一旦疫情稳定，老百姓就会把这些钱花出去造成通胀。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因为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老百姓即便没有收入也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老百姓愿意消费，敢于消费。疫情期间，美国政府一直给老百姓发钱，即便它的经济活动、就业和收入受疫情冲击，但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其通胀源于社会消费需求强劲而生产供给较弱。

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我国在早期疫情防控得力，快速复工复产保证了生产供给相对稳定，但老百姓的需求受到疫情严重冲击。除了已提到的居民收入低、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外，我国较长时间采取严格防控措施也影响到老百姓的就业和收入，最后影响到社会消费需求。疫情期间，很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政府给老百姓发钱以刺激消费，尤其是要发给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人。但中国政府偏好基础设施投资，而投资难以直接帮助受疫情冲击严重

的低收入群体，很多失业的老百姓已经花掉疫情前的全部储蓄。由于没有额外的政府补贴，社会保障系统也不完善，所以短期内我们的消费也不可能实现明显反弹，更不可能出现萨默斯所预期的美国式通胀。随着疫情防控政策放开，经济活动恢复正常，2023年的社会消费会有反弹，但老百姓的消费不太可能出现“报复性反弹”，报复性消费最多在高收入阶层和个别消费领域出现。

因此，2023年的经济稳定最终还是要靠投资。制造业的投资能不能起来取决于国内外订单的恢复情况。政府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新基建、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仍将对稳经济发挥最大的作用。消费会温和反弹。出口面临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23年全球会有1/3的经济体出现萎缩，这意味我国2023年的出口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保持高增长。

2023年的经济走势会是“宏观反弹，微观困难”。

宏观反弹，是因为防控政策放开后，经济活动会恢复，经济增长会复苏。

微观层面，首先是消费快速复苏比较困难。经过三年疫情，居民资产负债表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储蓄消耗殆尽，且有不小的零储蓄群体。尽管中国也有高收入人群，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服务类消费也有明显反弹，但整体的消费只可能温和复苏。

微观层面的困难还包括中小微企业。疫情期间，美国的政策主要是保老百姓生活，供给相对疲软但社会需求依然强劲。我国的政策主要是保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中小企业吸纳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保企业就是保就业和民生，最终对稳消费、稳经济、稳增长有帮助，但在做法上局限于让金融机构给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尽管过去三年经济很困难，但中小企业贷款在2020年增长30%，在2021年和2022年增长25%，这说明金融机构顾大局。但从另一个角度

看，这些政策与经济规律不合。假如你是银行行长，在经济困难且中小企业发展不稳定时，你对企业放贷应更加谨慎，但却要响应政策增加贷款。

2021年年底，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国企，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2008年全球危机以后，民企和国企的资产负债率明显分化，国企的资产负债率相对平稳，民企直线下降。当时所谓的“去杠杆”政策导致民企借不到钱，甚至在2017年、2018年引发民企融资危机。但没想到几年过去，民企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从积极的角度，说明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缓解；从消极的角度，民企的资产负债率越高，杠杆率越高，下一步发展的约束和挑战就越多。企业杠杆率太高意味着一旦现金流出问题，企业将无法继续生存。2009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共同著书《这次不一样》，回顾了过去800多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其中一条就是借债过多，早晚要出问题。

综上所述，2023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会改善，但微观层面的困难还会持续。解决问题需要时间，由于家户和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困难，经济复苏会比较缓慢，消费也难以出现报复性反弹。

因此，当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就需要新的增长模式。

新的增长模式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与过去相比有几个新特征，包括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49年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要靠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高质量发展就是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增长不能再是过去那样的粗放式。北大国发院和布鲁金斯学会联合发布了《中国



2049》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提到，和过去40年相比，我国未来30年经济增长模式会发生变化，具体有三个原因：一是低成本优势不再持续，二是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老龄化，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要发生改变。

过去我国具有低成本优势，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型增长。现在我们即将达到高收入水平，需要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更高技术含量和更高质量的产品才能保持国际竞争力，否则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国家因为生产成本提高，但没有能力创新产品，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就此而言，未来的增长要更加关注创新。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已出现逆转。过去我国的增长模式是“两头在外”，今后则更多要靠国内市场来推动。

决策层提出了“双循环”，即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到40年，我国主要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赶上了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很快就参与到国际劳动分工中。在改革开放的头30年，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的两个因素都与外部经济有关，一是出口市场大幅增长，二是外商投资大增。但今后再想依靠这两个因素维持增长已非常困难，因为全球市场的开放度在下降。

此外，中国从小经济体变成大经济体。此前，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供需调整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如今中国每做一个微小的调整，全球市场都会有反应。形象的表述就是中国买什么，什么就变贵；卖什么，什么就变便宜。因此，过去那样年均出口增长20%且连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也是我们提出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大背景。

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有两点，即供给和需求，关键是把这两个核心点循环起来。

供给方面，我国人均GDP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0美元上升至126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有极大改善，劳动力成本也提高很多，所以我们要生产与成本相匹配的产品才能在国内外市场保持竞争力。

供给方面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创新。经济学认为创新最终体现在总要素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持续改善，产品的附加值比例不断增长，即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经济模式的核心问题是能否实现创新。如果能创新，供给才能持续增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过16000美元后不再容易保持增长。这也是我们将来的挑战。

同时，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既可能是学习模仿式的创新，也可能是原创性的科技创新，还可能是商业模式创新。这些创新都很重要，但决策层可能会更加偏好科技创新。不管哪种创新，最终要看能不能提高生产效率。

需求方面主要指消费。我们投资相对强劲，消费能不能起来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很重要。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一直强调要增强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而国内需求归根到底就是消费。

消费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多大作用？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议，包括我们北大国发院很多老师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下阶段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出口和投资，而要更多依靠消费。也有人认为消费拉增长不可靠，过度依靠消费促增长的国家最后都发生了危机。我的看法是，未必一定靠消费拉动需求，如果没有真实的消费动力，消费的拉力也不可持续。因此，我不太赞同所谓“刺激消费”的说法，因为消费最终要由收入和信心支持。拉动消费需要有完善的社保体系，老百姓手上有100块钱要敢于都花出去，否则他们还会想存下50块钱，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为什么疫情初期

居民收入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储蓄率依旧上升。

消费在经济中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消费需求，投资就会变成过剩产能，最后增长也无法持续。我国投资很强劲且消费疲软，但为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一直没有爆发？因为产品大都出口海外，尤其是美国。美国消费很强但投资不足，我国刚好相反，两者互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发明了一个词叫Chimerica，即当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互补时，双方经济中的失衡得以对冲。然而，过去通过出口来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做法在未来将要失效，因为出口局面已变，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需要提高。

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多少才合适？可以跟其它国家做一个比较。目前我国消费占GDP的比例大概是55%，日本大概为75%，英国、美国都在82%以上。如果中国的消费占比达到75%，对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都将带来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产生了两个世界级影响力：一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很宽松，经济增长很活跃，就业很充分，但没有发生通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大量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稳住了消费品价格。因此，我国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大规模出口降低了各国的通胀水平，这是中国经济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表现之一。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我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渐失。二是从本世纪初起，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开始发挥很大作用。经济周期一般而言会五六年发生一次，但澳大利亚维持了25年的繁荣，原因就是我国在当地投资以及对当地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当然，中国经济的这一世界级影响力也在消退。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世界级的影响力可能来自中国的消费市场。

中国有14亿消费者，并且刚要迈入高收入经济门槛。目前我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已经排名世界第一。如果国民收入能持续增长，未来最令人兴奋的故事就会发生在中国的消费市场。我国的消费不仅可以和供给创新实现良性循环，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还会吸引全世界生产者的关注。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预期，问题是我国的消费在过去一直不行，如今怎么才能转好？我认为主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1. 通过初次分配让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降低政府和国企在整个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把更多的钱分到老百姓手里；
2. 增加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平等程度，这需要政府出台适宜的再分配政策；
3. 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让老百姓敢于把手里的钱花出去；
4. 推进城市化。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年均消费量比农村居民要高三倍多。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减少，我们未来30年的社会消费需求面临下行压力，但如果考虑到收入增长、社保改善、收入分配优化和城镇化推进等因素，我们的消费依然有非常强劲的增长潜力。

综上所述，如果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未来就要让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消费市场的壮大既造福中国生产者，也惠及全世界的生产者。

这里讲的消费不是指购买奢侈品等高端消费，而是大众消费。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需求将不断提升，创造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发展机会。

为此，具体经济活动也需要转向。过去我们以低端制造业和粗放式增长为主，将来需要更多



转向绿色、创新、数字经济。总之，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巨大。

从国内经验来看，经济活跃地区的特点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 第一，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作用；
- 第二，企业家努力拼搏，碰到困难也不放弃；
- 第三，政府是有为政府，重点维持市场秩序，

提供基础设施，克服市场失灵。

凡是在这三个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地方，经济向上的力量就难以阻挡，比如国内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总体而言，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适度乐观，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但前提是政府、企业、市场三方合力前行。

卢锋¹¹：青年就业处在最困难时期 但凡能帮助年轻人就业的举措都是有益的

自 2020 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曲线呈逐年上扬态势，且青年失业率每年均呈倒“V”型增长，7、8 月达到年内高点。按季节走势判断，目前青年失业率可能仍处在爬升阶段。北大国发院教授卢锋判断，目前国内正处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就业的最困难时期。并且，较高的青年失业率不是短期问题，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比如 2-3 年内）都会持续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去理解当前青年失业的现状？青年失业率走高是否会成为中长期问题？哪些因素导致了青年失业率的走高？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去应对？针对上述问题，近期经济观察网专访了卢锋教授。作为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他曾经担任财政部、人社部以及国际组织 AMRO（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咨询组专家成员。

青年就业冲击的回顾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此前一共经历过四次比

较大的青年人就业冲击。

第一次是 1980 年的知青回城。当年回城知青数量很难有准确的统计，一些统计显示为约 500 万。当时全国城镇就业人口只有约 1 亿人，如果把 500 万人都视为失业，相当于整体失业率增加了四五个百分点。当时就业压力引发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放开个体户，同时由于宏观经济在改革初期增长得很快，1982 年，回流知青的就业需求基本被消化。相当于这一次比较严重的青年失业只持续了不到三年时间。

第二次是因为 1989 年宏观经济增速的下滑。1989、1990 年中国 GDP 增速分别为 4.21%、3.92%，比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 GDP 平均增速降低了约 6 成，这样低的 GDP 增速一直到 2020 年才被打破。但这一次宏观经济的波动对城镇失业影响不是那么大。宏观经济不好，劳动力市场最先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农民工。1989-1990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了不到一个百分点。当然，城镇登记失业率在反映失业情况方面不是很灵敏，但总体上，当时城镇就业受到的冲击比

11. 卢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曾任北大国发院副院长、英文杂志“China Economic Journal”创始主编、中国财政部和人社部顾问、东盟 10+3 宏观研究办公室（AMRO）顾问委员会成员、世界银行 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咨询委员会成员。



较小。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民工转移到城市的人数大大减少。1989-1991年，农民工转移到城镇的人数平均约为100万，远远低于早几年的600余万。也就是说，这次失业压力也很大，但更多被农民工转移至城镇的数量减少而消化。

第三次为1998年的下岗潮。1997-2002年，这四五年时间是改革开放以来，整体就业最困难的时期。预估有上千万人甚至2000万人下岗失业。尽管登记失业率仅增加1个多百分点，但按照我们的测算，如果把下岗工人算进去，整体失业率可能在8%上下，这是非常严峻的就业压力。不过这个时期对青年人就业的冲击反而比较小，影响最大的是当时40岁、50岁那一代人。因为年龄的缘故，他们知识和能力结构比较稳定固化，转岗适应其他工作岗位比较困难。而当时，东北年轻人就大量迁往南方，所以青年人就业压力不是主要矛盾。

第四次为2008-2009年，这次的就业压力持续时间其实很短。2008年底，发生了1500万-2000万的农民工短期回流，里面包含了大量年轻的农民工。但是紧接着政府出台了“四万亿”一揽子刺激措施，到2009年第二个季度经济就开始快速反弹。加上国际上美国、欧洲经济也在刺激政策下恢复得比较快，所以这次外部危机冲击派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从农民工转移、新增就业人口等劳动力市场指标上有不同程度显著表现，但是在城镇登记失业率年度数据上几乎是波澜不惊。

目前国内正处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就业的最困难时期。按照季节走势判断，今年的青年失业率可能还在继续走高，在七八月达到峰值。2020-2022年，青年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处于较高状态。如果顺利，青年失业率回落到均衡状态至少需要两三年。算下来，这次青年失业率高企总共或持续五年以上。

并且，2020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整体趋势是

上升的，说明青年就业困难整体在增加。我认为，判断青年失业率走高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可能比较勉强，但它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

青年失业率为何逐步走高？

2020年以来，青年失业率逐步走高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全国劳动力供给数量在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2012年开始下降，从2010年至2020年，减少超4000万。根据“七普”等数据的观察和推测，青年劳动力供给一直到2030年都会持续上涨，而高校毕业生可能在今后的三五年内，也会继续上升。2022年大学毕业生数量为1076万，2023年相比2022年增加82万达1158万人，高校毕业生的增加也使得青年就业的总量和摩擦性失业都在无形地增加。

其次，2023年经济确实在恢复，这有利于青年人就业，但宏观经济的恢复没有原来预想的那么好、那么顺利。这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用工信心不是特别强，这同时也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便短期内经济复苏、终端产品需求增加，企业会将其看作短期现象，在增加岗位招聘数上不会马上作出反应，而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扩招态度，宁愿增加员工加班时间。这也是导致就业不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人工智能的普及对未来的就业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企业在增加用工方面，也会因为AI的普及而变得比较审慎。

另外，疫情期间遗留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前几年找不到工作或找到过渡性工作的人群，也会开始积极地寻找工作，这会进一步增加岗位的竞争情况。

上述原因很难在短期内消失，所以青年失业率升高的问题至少短期内很难解决。

就业市场整体失业率走势

相比青年失业率，我认为整体失业率未来压力不大。1962年，全国出生人口出现了一个跳升（1962年，全国出生人口由前一年的1189.9万跳升至2464万），按照时间推算，2022年-2023年，满60岁退休的人口数会显著增加，这个因素会导致总体劳动力数量相比前一年更大幅度减少。如果工作岗位需求不变，这对满足整体劳动力需求是有利的。

从就业形势来看，虽然4、5月一些宏观经济数据的增长不达预期，但经济仍处于持续恢复状态。因此总体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年度数据保持在5%-5.5%不是很困难。

面对走高的青年失业率，我们应该采取哪些举措？

我们应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去讨论如何应对。

首先，宏观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是基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劳动力需求是派生需求，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企业主用工需求的增长。宏观经济对就业形势的制约是近几年一个非常突出的问

题。前几年，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疫情的制约，虽然现在疫情的直接影响已经消失，但经济增长依旧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强调跨周期调节，下一步有必要更加重视适时适度进行逆周期调节。

其次，重视民企的重要性，这也是市场层面一直在强调的。对民企的一些扶持政策还是要落实到位，解决引起民营企业信心不足或预期不强的问题。因为年轻人在就业上往往缺乏经验，需要花时间培养，对于企业而言，如果预期不好，就不会轻易招聘年轻人。

同时，青年人就业也受到一些力度比较大的政策的影响。合理监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监管要透明化、法治化，尽量减少对就业的冲击。比如，2021年校外培训、房地产、互联网行业收缩下，影响的就业人群主要就是年轻人。

最后，一些持续促进就业的政策还是需要继续推进。比如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规模以及5月15日人社部等十部门提出实施的“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等。“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可能没办法解决根本性问题，但作为过渡方案也能发挥诸多作用，过去也有过类似的办法。

总之，但凡能帮助年轻人就业、短期内缓解就业压力的举措，在我看来都是有益的。当然，政策措施还是要尊重青年就业人口本身的主观偏好、诉求，提升相关干预措施实际成效和持续性。

版权

主 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主 办：北大国发院智库、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主 编：姚洋、黄益平

副 主 编：黄卓

执行主编：王贤青

栏目主编（栏目顺序）：王勋、梅亮、朱丽、白尧

编辑部（按姓氏拼音）：杜晓梦、范保群、何晓贝、王进杰、谢绚丽、许宪春、易媛媛

选题委员会（按姓氏拼音）：

符 永 康（中国新闻社编委、中新经纬总编辑）

高 岚（联想集团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

何 刚（《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

刘 二 海（愉悦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刘 娟（新华网副总编辑）

刘 军（前美菜网CHO，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长）

吕 守 升（高潜咨询公司董事长、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

马 洪 涛（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乔 顺 昌（茂天（北京）投资公司总裁、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王 海 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北大国发院双学位校友）

文 钊（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乌兰图雅（玲珑格致国际公关咨询CEO、北大国发院MBA校友）

武 雪 松（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许 芳（深圳市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长、北大国发院CHO100联席理事长）

余 兰（20年知名互联网公司营销高管、AI应用创业阶段、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张 继 伟（财新网总编辑、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赵 雪 源（北大国发院MBA校友）

周 瑛 锋（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朱 晓 楠（GC首席人力官及投资MD、北大国发院CHO100成员）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合作联系方式

王老师: 18600360496

高老师: 13911992798 (同微信号)